

百色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地级市,地处南国边陲,因百色起义而广为人知。百色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具有古老神秘的旧石器文化、骆越文化,又有多姿多彩、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红色文化,是多种文化交融叠加的“富矿区”。百色的文学创作氛围浓厚。近些年来,杨映川、陶丽群、罗南、潘小楼、许雪萍等一批女作家以群体形态崛起,引起广泛关注。为研讨和总结她们的创作成就和特色,百色市今年3月召开了“百色女作家群”创作研讨会,与会评论家、编辑从不同视角对杨映川、陶丽群、罗南、潘小楼等作家的作品进行研讨。



杨映川



陶丽群



罗南



潘小楼

## 百色女作家何以成群

□牙韩彰 莫维铭

彩的评论。

“百色女作家群”成员的年龄结构形成一条完整的成长链,表现出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悠长力量。从她们的年龄段来看,涵盖了从“50后”到“00后”的各个时间段。“50后”的有黄小卡、黄碧功;“60后”的有姚俞任、梁银雪、谭斌、黄金淑;“70后”的有杨映川、陶丽群、罗南、许雪萍、黄新闻、黄雪婷、杨文嘉、凌秀香、罗小莹、黄玲娜、黄华婷;“80后”的有潘小楼、黄素云、周桂植、陆君、覃雪娇、卓丽丽、梁小铭、黄玉美;“90后”的有杨彩艳、吴灵词、文晶艳、咣头10(江了了)、黄凤欢、黄霞、刘银燕;“00后”的有唐秋玲等。

我们欣喜地看到,“百色女作家群”中的代表性作家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能力,最近几年有分量的作品频频问世。杨映川的《住在香樟》《总有人看着我》《一千零二夜》,陶丽群的《黄昏的酒》《有人深夜放烟花》《净脸》《周年忌日》《平安房》《万物慈悲》等小说和《一生一世》《凛冬》《生命底色》等散文,罗南的散文《后龙村扶贫记》《然鲁》,潘小楼2020年创作的网剧《孩子们》和2021年创作的散文《她的乡》都有不错的反响。

而“90后”“00后”作家也在加快发展的脚步。其中,杨彩艳、吴灵词、文晶艳三人尤其值得关注。杨彩艳的中篇小说《我们的童年谣》发表在《广西文学》2017年第1期,并获得当年《广西文学》年度优秀作品奖。吴灵词的《如果遇上春天》《搭乘一条河流回家》《地之角》《太阳树》等诗作陆续发表于《诗歌月刊》《青春》《广西文学》等刊物,表现出一定的创作潜力。文晶艳主要创作网络文学,2018年以31万字的《始知相忆深》荣获第四届广西网络文学大赛三等奖,此后又陆续创作了《归期未定》《醒红的光》《鹊仙楼》《仙鹭双杰》《美好依旧》《区区满怀宇》等作品。

综观“百色女作家群”的创作成效,如果说“50后”“60后”作家们的努力是属于酝酿和打基础的阶段,那么“70后”“80后”作家的整体性出现,则标志着“百色女作家群”的正式登场,而“90后”“00后”更年轻新一代作者的接续出现,是

以可持续发展的有生力量在继续往前走。我们期待“百色女作家群”成为一支绵延不断又生机勃勃的文学力量。

“百色女作家群”的出现,自有其独特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上的决定性因素使然。其中,作家的创作态度和理念,作家对故乡的人文、历史、习俗、自然等诸多元素的个性化理解和表达,作家对时代、生活、社会的深入思考等等,都是一个地方文学创作得以发展壮大的综合性条件。如何进一步推动“百色女作家群”更好发展,尚需进行多层次的深入思考和采取多层次的有效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作为作家,任何时候都要把创作当作中心任务,用作品说话。“百色女作家群”的以往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百色文联将进一步努力为作家们的创作营造良好氛围。具体说来,要进一步积极开展有效的交流、研讨、培训、宣传、推介等活动;重点办好各类文学阵地,组织知名作家深入学校、图书馆开展文学讲座辅导,举办阅读分享会,促进文学新人的大量涌现;整合百色本地乃至广西高校的文学力量,加大对“百色女作家群”代表性作家作品的研究;建立百色文学馆,将其打造成促进百色文学创作、研究、宣传的综合平台;加大对百色原创文学精品扶持力度,探索设立文学奖励基金,试行作家签约制度。百色这片位置独特、风情浓郁的多民族聚居的红色沃土,本身就是文学创作的资源宝库,可以结合各个重要阶段的中心工作,策划选题,邀请外地作家和本地作家联合采访,鼓励作家们抒写百色、讴歌百色、弘扬百色,还可以采用联合办班形式,让“百色女作家群”的作家们有更多机会走出去,扩大视野、增长见识、开阔思路,不断激发创作灵感,相信这一创作群体体会不断发展壮大,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

(牙韩彰系广西文联原副主席,莫维铭系百色文联主席)

## 文学筑坝者与地域文化底色

——百色女作家群创作简论

□冯艳冰

百色是个神奇的地方,有着灿烂的历史文化。大石铲文化、布洛陀文化源远流长;风起云涌的百色起义,依然激荡着百色儿女的心灵;在民间则有长盛不衰的壮族始祖雅芒和抗倭女英雄瓦氏夫人的传说。百色还有闻名遐迩的澄碧水库,它因澄碧河得名。这条河原来只是云贵高原崇山峻岭中的一支细流。因为筑坝,改变了一条小河的命运。筑坝之后,河流没有止步,继续沿着右江奔流而去,汇邕江,入郁江,引西江,接珠江而汇入大海。在这样的环境中,百色出人才是必然的,百色出作家艺术家群也是必然的。

有如此绚烂的文化,得有传承人和守护者,得有人像筑起澄碧湖那道大坝一样筑起百色的文化之湖,这是使命的召唤。就这样,百色女作家群以颇具创作实力的群体形象走到了人们面前。她们都是喝着澄碧湖水长大的,现在她们共同用自己的作品为建造百色文化之湖的大坝添砖加瓦。表面上看,日常生活与工作之中的她们并无太多交集,写作风格各异,更无形成文学艺术流派的可能。百色女作家群现象一定与历史文化发达的根系有关。从性格的倾向来看,她们有共同的一面,即既有山地民族的倔强,又有平原河谷民族的雍容。这种性格的底色,玉成了她们共同的文学追求。她们的文学激流,不停地冲击着读者的心扉。

杨映川有着小说家特有的目光,往往一个细节在她手里就可以演绎成一道绵长的文学风景线。杨映川有着从乡镇走向城市的经历,善于把握时代进程中的个体命运。对生命价值的探寻、对生存的拷问以及温和的批判意识,一直是她作品的主题指向。所以,她总是给笔下的人物设置种种困局,让他们在围城中不断试图突围,在不断的失衡中寻找立足点。《有人睡着就好》写的是同一张床上的故事。失眠的人、沉睡的人,各自上演了自己的喜怒哀乐、痛苦挣扎。人生的同床异梦,各种困扰交织在一起,咫尺之间,也是风云变幻,让人读出一些言外之意。《一千零二夜》中,曾白青、徐生甘像强扭的两只瓜,转着转着,竟转成了一个瓜。小说写的是现实的艰难和对困境的突破。杨映川把无数的同情给了她笔下的人物,让时代的缩影最终投射在一个个具体的人物身上。

在创作的自觉意识上,潘小楼一直试图让自己往回走,让精神不断地返回原乡,努力使之成为自己小说艺术的底色,并在原乡和城市之间、原乡和异乡之间,发掘潜藏在日常生活的参差冲突。作为一个触地的编剧,她的小说却少见影视剧描写的全景式的故事框架,纵横开阖的情节冲突,更更多的是心理描写。潘小楼的小说有浓重的青春气息。她把艺术的关注点放在了年轻一代,揭示了她们的挣扎和忧愁以及成长的动力。近年来,潘小楼的作品更多的是关注城市里的“围城”生活。也许,需要如她描述自己创作时所说的,要返回原乡,在不断地返回中,让原乡成为她形而上的艺术源泉。

看了陶丽群的小说《净脸》,我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陶家有女初长成,才华让人惊叹。《净脸》特别的题材,决定了它的写作难度。总感觉,能这么好好地写完这部小说,情节,与作者的年龄不甚相符。洋洋洒洒的四万字,笔触密集,笔调沉重,色调冷酷。小说中的莫老这个人并不复杂,她只拥有高傲的职业操守和卑微的日常生活。她的高傲,源于她对死的理解;而她的卑微,源于她从事的这个几乎被所有人包括亲人在内都嫌弃的职业。写底层,写净脸人一生的孤苦,写死的悲凉和底层际遇的悲凉,写命运的无常与无奈,写生与死的一纸之隔。作品呈现的是桂西北山地少数民族的一种奇风异俗。人死了,都会享有一次非常有仪式的沐浴。由净脸人为其擦拭干净,以洗去种种悲苦或罪孽,实现人皆洁净而来,也应洁净而去的初心。作品呈现的是在生命最后途程的温暖的人性光辉。这部小说,确认了陶丽群的写作实力。应当承认,陶丽群有过人的铺叙能力,她凭借着独特的抒情笔法、散文诗般的重峦叠嶂的环境描写,以及绵长的叙事风格,有望展开有规模有体量的艺术冲峰。陶丽群正走在创作的勃发期,读她一部接一部的新作,就能感觉到她在努力地奔跑着,在创作上处于上升、加速的状态。

罗南散文以绵长细腻的描写见长。她把目光和笔触投向最普通不过的身边人。她似乎力图在以静制动,在缓慢得难以踪影但又确实在日复一日变化发展的民俗和心理状态中,寻找时代的滋味。她娓娓道来,通过家长里短、妯娌婆媳的众生相,向人们呈现了一幅带着时代温情的乡村画卷。落笔恣逸之处,虽不见惊风骇雷、山乡巨变,但却给人以一叶知秋的刻骨之感。从观察到写作,她都贴着生活的情境走,显露出淡淡的自然主义的审美倾向。罗南在题材的发掘方面有着特别的敏感。她写得最出色的一篇是以扶贫为题材的散文长卷《上龙村扶贫记》。但她的近作《一个人的房间》立意委婉而独特,发微掘隐的抒写和切肤的体验,以及从容的叙事笔调令人感叹。

从百色走出来的女作家身上可以看到,寒窗苦读和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块最直接、最便捷的敲门砖。改变命运的渴望与改变世界的使命融为一体,一个人的信仰的时候,它迸发出来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也因此,这些女作家和从桂西北走出来的男作家们一起,构成了文学桂军的重要力量。从总体上看百色女作家群的艺术水准已经相当高,目前已是广西女作家群的中坚方阵。成熟、稳定、坚定地行进的立世风格以及频发的作品量,使这道美丽风景由表及里更为名副其实。

应当看到,她们还有进一步提升的广阔空间,希望她们的作品能带来读者所期待的冲击感和震撼力,甚至如狙击手的神奇子弹,具有精准而强悍的穿透力。

(作者系《广西文学》副主编)

## 性别视角、民间意识与南方写作

——以杨映川、陶丽群、罗南、潘小楼为例

□曾攀

广西百色女作家群体的写作,以自身独有的性别视角,以及隅于边地的民间和民族意识,糅杂南方地区的风物,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从这一写作群体的文学文本中,可以见出当下女性文学所展开的可能性。她们的写作更多地探入人性与自我,切近时代和历史。广西百色女作家的创作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野性的生命意识、笃定的民间信仰及个体信念,都展露着自身的异质性和辨识度。可以说,女性作家的创作是一个极富意味的现象与镜像,更在历史的宏大语境中形构新的精神装置。

陶丽群的中篇小说《净脸》,无论是叙事景象还是话语修辞,都颇具鲜明而异质的风格。“净脸”是壮族地区的民族传统习俗,主要是民间给刚死去的人洗净、清洁,让其有尊严地“上路”。小说写生活在少数民族山区的莫老太的生命抉择与行迹,她为不计其数的死者“净脸”,功德无量,却在泥沙俱下的民间经历了自身的曲折。小说甚至以某种幽灵叙事写出了生与死之间界限的弥合,当然其中也透露出代人的彷徨和献祭。最为惊心动魄处,是莫老太在边境遇到的一具血肉模糊的尸身,但她专心致志为其净身,以勇毅挚切超越死亡和血腥的恐怖,将小说的境界推向深邃与开阔。短篇小说《有人深夜放烟花》写自闭症儿童家庭中的母亲遭际,女性的伟大固然孕于平凡之中,但更深切地体现在生命的倾斜与裂变之处,陶丽群一寸寸地析解在困境中跋涉的母亲陆芝莲的内心,显露她的沉重与苍凉,也慢慢堆积起无比温情却又不可撼撼的精神立柱。女性回到真正的自我,回到日常的家庭,回到己身最适切的境地,从精微而至广大,这个过程极为艰难,却是她们义无反顾之路径。

杨映川的短篇小说《住在香樟》,将凶宅的故事讲进两口子的生活之中,透视当代城市的生活艰辛与心理困境。夫妻俩同住凶宅,遭遇着来自生活和职场的双重夹击,妻子俞顺顺奋起一搏,反戈一击,她的软肋反成其盔甲和武器:“她雄赳赳走到小区门口,高大闪亮的门牌写着香樟三个大字,她无比仰慕地看着这三个字,她好像仰慕的是自

己,她想,大姐我凶宅都住了,我他妈的还有什么可怕的!”悬崖边上的反转治愈了她的怯弱,也重振了一个原本弱势的女性的气力与雄心,使其反转职场、生活的境遇。凶宅因此成了现实的庇护所,这背后无疑折射出当代主体的裂变、人性之怪现状以及女性的另类艰困。中篇小说《一千零二夜》更是故事交叉着故事,在双重的现实与虚拟世界之间架构桥梁,最终是为了抵达并拯救最幽邃的人心,而这个历程寄寓着女性本身的妥协、斡旋与重新的关联、融合。小说写到男女主人公徐生甘和曾白青第一次见面,他“朝她伸出手来,他们的手互相握了握,都凉,没有什么温度”。后来,因为失眠,曾白青开始给徐生甘讲故事。这成为了一种常态。小说作为一种故事,为另一种“故事”所叠加,并且“故事”的功能也发生了转变,“故事是说给徐生甘听的,她不是倾诉,而是借此告诉他,债业不应该传承,她曾经是那样一个牺牲品”。在这个过程中,虚构紧密对应着现实,告诫、拯救,甚至是自我献身,她最后用姥姥的故事表达要给他生孩子,试图消弭他的仇恨,“故事”的无功利性始终显露自身的现实功能。跳出来看,这又何尝不是小说本身的指向,以虚乱实,拯救人心,慰藉魂灵,最起码,将人引出暗夜,再行沉思。

潘小楼的中篇小说《南风吹过露台》,讲述了现代女性的处世之道。作者执着看清楚那种冷冰冰的现实,辨析真假,过滤虚幻,讲述女性从秩序到博弈再到坦然不惊,进入一种生活化的新形态。“我”将之视为所谓的“关系”,自然是平等的,但是又为俗常的时日和事务所牵连,正是这样的关系维持着当代情感/婚姻的基本平衡,当然这个平衡往往裹挟着隐忍、妥协、退让,除非在某种悲剧性状态下到达临界点,最后发生崩塌。小说里,艾菲与生活中并不亲密,甚至有些疏离的丈夫相处,却常常生出这样的喟叹:“毕竟,眼前的这个男人,是她自己选的。”而且面对丈夫种种似乎难以容忍的日常,她欲言又止,还是选择了忍耐,“她看着他,忽然觉得没了开口的必要”。而在感情中牺牲妥协、

磨平棱角以达成的“平衡”,只是求稳的“中年”心态引发,甚至有时候都无法将之诉诸利益和欲望。小说将女性心理写得很通透,编织一种情感的与心理的网络,细腻、绵密,有很多男性作家作品所缺乏的那种黏稠感。这又与南方的亚热带气候相契合,小说的湿润度、饱和度恰到好处,是南方地区的“南风”天气行将结束时吹拂的清爽通透的北风。潘小楼的女性意识是渗于肌理的,同时反馈在工作与生活的细密周遭,于城市语境中塑造出独特的女性形象。小说主要叙述的是艾菲和苏米们的女性处境与情感选择,中间穿插着她们的成长史,由此述及她们大学时因谈对外汉语专业,在越南河内的实习时光,仿佛一出蒙太奇式的双城记。与南宁一样,河内也是亚热带,但风情与景象又各有不同。最后,她们都遭遇了生活的围困与生存的艰难,并为此不断付出努力。小说最后,艾菲和苏米的不同际遇及选择,代表着女性意识延伸的不同路径。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艾菲的露台,还是苏米的孤岛,不仅喻示女性的处境,而且代表着她们观看的姿态与立场。这样的庭院,包括艾米的露台,对应的是女性所拥有的空间和余裕。在那里,她们有回旋的余地,有进退的准备,可以从容面对自我,怡情养性,环顾四周;又能对视乃至对峙男性与世界,筑起堡垒,虽此非必然,但始终有所凭依,当然也有可能是接纳和糅合,意味着温情的愿景。总而言之,那是她们现实的避难所,也是精神的乌托邦。

罗南的散文常常从女性的个体经验出发,创设出多重维度的隐喻,掺进了虚实的对照与文体的糅杂,以探询更为深邃的生命世界。在《迈囊》中,执迷于中草药的迈囊过世,人们发现他床榻的席子下面,铺满了儿子买给他的西药药丸,那是他所弃置却又不肯彻底丢弃的东西。不得不说,这是一篇充满现实感与隐喻性的散文,其中呈现出虚实交错,而且凸显丰富的文化征候。不单如此,对于罗南而言,也许在散文小说化、小说散文化的文体糅杂中,能够探索出更有意味的斡旋世界。实际上,纵观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小说与散文的互渗乎文体的新探,从废名、沈从文,到孙犁、汪曾祺等,都为当下的文体变革提供了范型。

总体而言,从以上几位百色女作家的作品中,可以见出她们在纵深感与浑厚度、全景图与横断面以及在异质性与辨识度上作出的努力。当然,其中也多有不足之处,需要打磨和夯实的地方亦不少,比如,从个体的经验中走出来,从单一的地域中走出来,从俗常的语言中走出来,探索更加广阔的文学未来。这一切需要文学写作上的突围。

大体而言,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女性写作,经历了革命时代的“革命性”,后革命时代的“博弈性”,再到当下新的平等视阈中的“关联性”。质言之,当代中国的女性写作关联域更大了,至少从如今重新集结的女性书写中可以看出,她们以更自主的姿态,试图关联传统与未来、历史与时代,关联温情与幽暗,关联自我的内面与他者的共存。

(作者系《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



《不能掉头》,杨映川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母亲的岛》,陶丽群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秘密渡口》,潘小楼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

《后龙村扶贫记》,罗南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